

對全球史的幾點思考

董少新

毫無疑問，我們已處於全球化時代，而且全球化的步伐越來越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處理人類歷史同一性與文化多樣性問題，以及人類發展與環境關係問題。政治、經濟和學術等不同領域對全球化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和應對方法。全球化在歷史學界所引起的反響，則主要體現在全球史理論和實踐的出現與迅速發展。儘管具有宏大敘事特徵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書寫有著古老的起源，但全球史是全球化的產物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全球史是身處全球化時代的歷史學家對全球化形成過程的歷史追溯，試圖為解決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提供歷史視角，並嘗試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提供啟示甚至勾畫藍圖。一般認為，全球史是對整個人類歷史的宏觀敘述。但全球史不是人類所有歷史的綜合和總和，其研究的對象是超越國家、民族、文化、地域和政治形態的歷史進程，主要關注的內容包括跨文化貿易（cross-cultural trade）、宗教和各種思想觀念的傳播、技術的傳播、大規模移民、帝國擴張、物種遷移、傳染性疾病的擴散、氣候變遷及其對人類社會的長期影響等。

目前，全球史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已成為國際學界關注和討論的熱點，無論是關於全球史理論、方法的論文和著作，還是全球史研究機構、學者、學術會議和課程，都不斷湧現。全球史的興起會對歷史學中的其他學科分支，尤其是對傳統的貿易史、傳教史、文化交流史、國別史、區域史等產生影響，因此，從事這些領域研究的學者，也應主動關注全球史的理论與方法。

一、美國的全球史和中國的全球史

歷史學的每一次發展都可以從學術史脈絡和現實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語境中尋找原因。20世紀下半葉興起於美國的全球史（也被稱為新世界史 [new world history]）研究，也是如此。

20世紀兩次世界規模的人類戰爭，不僅使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空前緊密，而且也使國際性協商在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時（如戰爭危機）的作用顯得格外重要。聯合國成立的目的便是希望為國際社會處理共同面對的重大問題提供一種溝通機制。冷戰期間，作為世界一極的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需要具有全球性的視野，並且急需深入瞭解非西方世界。在這種需求下，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和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這兩位希臘史出身的學者轉向全球史研究，並取得開創性的成果和影響力，並非偶然。

從學術史發展脈絡角度來看，全球史在美國的興起是西方世界史、普世史的延續和發展。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在《什麼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一書中，通過分流（divergence）、合流（convergence）、傳染（contagion）和體系（system）四個全球史研究範式，對西方全球史做了學術史梳理和歸納，呈現出全球史的西方傳統與根基。此外，她還強調了

西方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生物學的發展對全球史形成的作用，她注意到許多全球史作者不是歷史學家，而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科學家，甚至是小說家。

全球史是歐美學界對 19 世紀以來廣泛流行的歐洲中心主義史觀的自我反思和突破。全球史將大範圍歷史進程引入歷史分析，從而使學界重新考察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全球史所重點關注的跨文化貿易、物種傳播與交流、文化碰撞與交流、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移民和離散社群等研究課題，無法在傳統的民族國家史或者歐洲史的框架下得到闡釋，而需要更為宏大的視野，將整個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強調區域間的聯繫與互動。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不僅解構了歐洲中心主義史觀，而且超越了所有以某種文明為中心闡發人類歷史的史觀。西方全球史觀的形成，是建立在西方學界對非西方文明史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的。本特利說：“目前的世界史研究都排斥那些目的論假設，即認為歐洲採取什麼樣的政治組織形式（比如民族國家）和經濟發展模式（比如工業化）都是自然或者必然的結果。同樣，目前的學術研究也都排斥歐洲人相對於其他地區的人來說擁有更突出的理性、創造性、勤勉或者進取等精神的觀點，因為歷史學家在其他許多社會的人們身上也發現了相同或相似的品性。”^①

全球史成為熱門研究領域，也體現了史學界和歷史研究受眾群體對史學過度專門化進而導致知識結構碎片化的不滿。過度專門化的史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尋求更大歷史意義的努力。歷史研究的受眾對重新整合歷史知識的需求和願望，激勵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在對更大範圍世界日益增進的理解基礎上，開始探求歷史上大範圍進程的發展動力。麥克尼爾曾追問道：“除了我們（歷史學家）之外，誰會真正關注我們的學術期刊和著作中那些細枝末節？”他相信，人類一直懷有對世界歷史的渴求，人類的大腦渴望盡可能宏觀地來理解一些事情。麥克尼爾認為，文明史方法（以湯因比為代表）把研究視野局限在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而不是跨文化的和全球的發展得以發生的更大地理空間，這樣就割裂了歷史經歷，因此有必要把整個人類歷史聯繫起來，使之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總體性、全球性和普世性。這便是他的“關於整個人類歷史的偉大理念”。^②

全球史興起於美國，直到現在美國的全球史研究仍是國際全球史學界的主體和主流，並居主導地位，甚至將全球史稱為美國全球史亦不為過。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全球史的觀念傳播到中國，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被譯成中文後，在中國成為暢銷書，風行一時。全球史作為一種新的學科和世界通史書寫方法，近年來也在中國受到歡迎。目前，中國不僅有全球史的研究機構，也有全球史期刊的發行。大量美國學界的全球史和新世界史著作，以及有關全球史理論的文章，都被翻譯成中文出版。

全球史在中國的流行，與它在美國的興起和流行有著類似但卻不同的原因。近 30 年中國迅速融入世界一體化進程之中，尤其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中國的全球化進程要求中國學術界具有全球視野，全球史理論、方法的引進和流行是中國全球化進程的需要和在學界的體現。

在美國，全球史是西方普世史、世界史的延續和發展，因此世界史和全球史這兩個術語區別不大，往往可以通用。但長期以來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幾乎等同於外國史，中國史與世界史涇渭分明。不久前，中國教育部將世界史升格為一級學科，與中國史、考古學並列為歷史學門類下的三個一級學科之一。這一舉措的出發點是表示對世界史學科的重視，但實際的影響恐怕是會導致世界史和中國史的進一步隔閡。而全球史在中國的出現，或許能在溝通中國史和世界史方面發揮作用。全球史在中國的流行，體現了一部分中國學者並不滿足於既有的歷史學科分類法，希望獲得

新的認識和研究歷史的角度和框架。另外，西方學界對歐洲中心論的自我反思，是中國學者所願意看到和接受的；而在全球史視野下，中國歷史和文化受到西方學界更多的重視和關注（例如弗蘭克和彭慕蘭等學者的研究）。

美國的全球史學者已認識到，全球史並非所有民族歷史的總和，而只是通過書寫人類共同的歷史來關注人類的共同命運。全球史書寫必須超越民族國家和文明區域，站在全人類的高度，力求反映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脈絡。這樣的歷史一旦寫成，理論上應該獲得世界各國人民的大體認可。但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有的中國學者在討論全球史時，會特別注意保持意識形態上的警惕性。于沛先生認為，“我們講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史觀時，注意分析全球化和全球史觀等概念的內涵，注意和西方資產階級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劃清界限，是十分必要的。”又說，“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才能科學地理解全球史觀。當代中國歷史科學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只能是唯物史觀。”^③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全球史書寫不具有普世性，而是各國有各國的全球史，各國的全球史有不同的立場和文化特徵，但都聲稱自己的全球史具有普世性，那麼這樣的全球史還能夠名副其實嗎？

二、全球史與人類認同

全球化的歷史車輪飛速前行，但民族國家將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繼續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史的書寫既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但也面臨棘手的問題。在沒有一種價值觀念獲得全人類的認同進而成為真正的普世價值的時候，不同國家的全球史書寫便會有不同的價值訴求。在價值觀念上存在多樣性的全球史，不是真正的全球史，也不能發揮真正的全球史所應肩負的使命。

我們需要一種能夠在構建人類認同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全球史。這是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面臨文化隔閡、環境惡化、能源枯竭等問題時，對全球史提出的要求。麥克尼爾對此持有樂觀的態度，他說：“不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生存在一個黃金時代，它為未來的時代定下了發展基調。在我看來，很明顯，通過構建有洞察力的、準確的世界歷史，歷史學家可以在為全人類和各民族創造可接受的未來中發揮綿薄而有益的作用。變動中的世界史形態對整體的人類歷史有一種清晰而鮮明的認知，可以使人類認清共同的利益進而緩和未來的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非常實用的。”^④

全球化與全球史書寫，將長期保持一種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係。一部真正具有普世意義的全球史，需要在不同民族的歷史學家之間長期交流、達成一定共識後，才能出現。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不同國家的上千名歷史學家編撰《人類史：文化和科學的發展》，耶魯大學拉爾夫·特納（Ralph E. Turner）擔任主編。特納預言這部著作將成為把人類歷史視為一體的思想源泉，成為迄今為止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他寫道：“只有持一種客觀的、不存偏見的態度，這一目的才能達到，這個事業具有永恆的價值，將使不同民族認識到他們之間共同紐帶，認識到自然而然的接觸所帶來的和諧局面，認識到表面分歧下一致性猶在，從而推進合作。”但在《人類史》實際編撰過程中，來自不同國家的歷史學家爭論不休，無法達成共識，最終這個美好的願望不得不以失敗告終。^⑤2002～2005年間中日韓三國學者聯合編撰《東亞三國的近代史》可被視為聯合國組織編寫《人類史》行為的區域表現。這部歷史教科書對東亞區域民族仇恨的消解、區域認同的構建能夠起到多大作用，仍有待觀察。但歷史書寫的跨國合作、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學家密切溝通與交流，將對真正的全球史書寫有積極作用。儘管這一過程將會很漫長，但別無他法。

全球化可以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前提是這種意識形態能夠得到各國知識界的認可。

超越民族、國家、政治和區域的全球史，無法也不必取代國別史和區域史。即使僅從歷史與認同關係角度而言，國別史、區域史和全球史也並不存在相互矛盾或相互替代性，而是分別與國族認同、區域認同和人類認同有關。認同具有不同層次，一個個體可能需要家族、公司、地方、國家、區域和人類等多層次的認同，但相互之間並不一定矛盾。人類認同的可能性決定了真正意義的全球史書寫的可行性。認同是群體內部的觀念一致性，用以區別他者。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沒有一個地位相當的他者存在，但是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和問題，可以扮演“他者”的角色，從而成為人類認同的依據。

從學術或學科的角度而言，全球史與國別史、區域史的研究對象、角度和方法均不相同，但是離開了國別史、區域史以及其他具體歷史的研究，全球史便成為空中樓閣。全球史重視不同區域間的大範圍互動研究，這不僅需要傳統歷史學研究的積累和支撐，而且文化互動的影響若不放在具體的區域和國家中加以討論，便無法呈現互動的價值。不全面梳理各民族文字寫成的歷史文獻，也無法發現互動內容和評估互動的頻繁程度與影響。儘管全球史不是所有民族、國家和文明的簡單疊加，但所有民族、國家和文明都是全球史的組成部分，只不過研究角度、取材的側重有所不同。在中國史的框架下，仰韶文化、紅山文化等史前文明，可以作為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證明，從而成為中華民族認同的歷史根據。而從全球史的角度看，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可以被視為這一歷史時期人類社會發展在東亞的表現，它們是整個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從而成為人類認同的歷史依據，因為即使它們與後來的中華民族有淵源關係，在當時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諸如中華民族這樣的意識。同樣，對於古代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甚至古希臘文明，中國人亦不必視之為與自己不相干的域外文明，而可將它們視為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類的共同遺產。

以人類認同為目標的全球史，用具有普世意義的人類歷史教育不同文化的人具有全球意識和共同的認同，並不必然導致文化多樣性的消失，相反多樣的文化是整個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豐富多彩的文化，即使在人類擁有了共同的認同以後，應該仍保持百花齊放、並行不悖的狀態。全球一體化是針對整個人類層面的價值觀念的角度而言，也表現在各經濟體的相互依賴和人類間交往與溝通的頻繁與順暢，這些的實現不應以喪失文化多樣性為代價。全球史應倡導和教育人們在人類認同的基礎上，認識、理解、包容乃至熱愛不同的文化。

三、作為方法的全球史

全球史不僅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現的一門新的歷史學科分支，而且是一種新的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可以跨越社會的邊界來清晰地比較歷史經歷，考察不同社會人們之間的交流互動，分析超越多個個體社會的大範圍歷史發展模式與進程。麥克尼爾認為，個體社會並不是歷史發展的唯一場所，歷史進程不僅出現在個體社會內部，還出現在兩個或多個社會之間，繼而他將這種認識發展成為關於全球歷史的動力理論。他在《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這部著作中強調思想和技術的傳播是世界歷史的發展動力，充分而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歷史觀。科廷（Philip D. Curtin）雖然不傾向於將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書寫，但他創造出一種頗具影響的方法，即通過個案比較研究來闡述關鍵性的全球研究課題，把比較世界歷史確立為研究全球史的一種獨特的方法。^⑥

全球史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宏大的歷史研究視野，而且這一廣闊的視野似乎再也沒有擴大的

必要。從人類甚至宇宙的誕生至今是全球史的縱軸，整個地球是全球史的橫軸，整個人類社會發展是全球史的第三維度。大視野不僅是撰寫“大歷史”所必需的，而且也為微觀歷史研究提供富有彈性的時空範圍。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既有其原因，又有其影響，而且事物之間普遍聯繫。在研究某一具體歷史個案時，自然要在此前的時空中追尋其起源，又要在此後的時空中考察其延續和影響。在全球史視野下，這種追尋和考察會具有更為廣闊的時空範圍，可以是跨文化和跨地域的，也可以是跨越時代的。在更大範圍中追尋和考察歷史個案的起源和影響，不僅會獲得更多的可能性，而且也會呈現該歷史個案更多的意義。

全球史將傳播與互動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因此諸如跨文化貿易、傳染病流行、宗教和文化的傳播等具有互動與交流性質的歷史內容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隨著技術的進步，傳播與互動的範圍越來越大，頻率越來越高，途徑越來越直接，不同群體之間也越來越相互依賴。全球史家認為，早在航海時代以前，亞歐非大陸便已形成了一個歷史複合體。霍奇森認為，所謂的前現代時期歐亞非文明地區的四個核心區域（歐洲、中東、印度及遠東的中國和日本）是一種不完善的歷史抽象概念，實際上，所有地區構成一個單一的、宏大的文化發展的歷史複合體。只有作為一個整體的歐亞非地區，才能為回答可能出現的更加普遍和更加基本的歷史問題提供足夠大的背景框架。^①這種超越國家和文明區域的歷史認識，源自對歷史上歐亞非內部密切關聯的發現。在此基礎上，亞洲視野（或全球視野）中的國別史便更具有實際意義，同時也會使國別史或文明史研究具有與以往不同的面貌。

跨文化比較研究是全球史的一個常用方法。全球史書寫過程中，會對同一時代的不同文明做整體性的比較和評估，其目的不在於評價優劣，而在於發現相互間的異同和關聯性。這一方法在研究宗教、思想、文化、技術的跨文化傳播時，尤為重要。跨文化傳播並非僅僅表現為空間的轉移，更為重要的是在傳播過程中或傳播完成以後的變異和反響。只有在更廣闊的視野下對不同文化有深入認識的基礎上，比較研究才能夠完成。例如，歐洲天主教聖母像在16世紀以後傳遍世界各地，傳播到不同地區的聖母形象會發生不同的變化。將這些變化背後的文化原因加以比較，並用全球史的廣闊視野進行綜合分析，便有可能獲得對聖母像的全面而立體的認識。

總之，作為方法的全球史對傳統歷史學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借鑒意義，用全球史的視野和方法研究傳統史學課題，是值得進一步嘗試的學術途徑。

①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新世界史》，周誠 第82～93頁。

慧譯，見夏繼果、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5頁。

②阿勒代斯（Gilbert Allardyce）：《走向世界歷史——美國歷史學家與世界歷史課程的問世》，夏繼果、王蘭娟譯，見《全球史讀本》，第111、114頁。

③于沛主編：《全球化和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8頁。

④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變動中的世界歷史形態》，張虹譯，見《全球史讀本》，第20～21頁。

⑤阿勒代斯：《走向世界史》，見《全球史讀本》，

⑥本特利：《新世界史》，見《全球史讀本》，第48～49頁。

⑦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歷史上各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李玉華、車雪瑩譯，見《全球史讀本》，第22～43頁。

作者簡介：董少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博士。上海 200433

[責任編輯 陳志雄]